

[英]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著 徐志晶 译

# 李鸿章传

图  
珍  
版  
海  
外  
经  
典  
传  
记

## 一个英国记者四十年中国生活札记

亲自采访过李鸿章的《泰晤士报》记者眼中的晚清四十年 再现晚清第一相的智慧与驭人之道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珍版海外经典传记

〔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著 徐志晶 译

# 李鸿章传

一个英国记者四十年中国生活札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译者的话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虽然他已去世百年，但是尚未盖棺定论。赞之者，如梁启超称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外国人则称呼他为“东方俾斯麦”；毁之者则称其为“大汉奸”、“卖国贼”。这正应了梁启超那句“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的评价。

本书作者布兰德于1883年来到中国，开始在海关工作，接着到上海市议会担任助理书记员、书记员。此议会为上海市租界机要机关，这就为布兰德了解清代政局提供了极大便利。此时的布兰德也是一名独立记者，奔跑于中国各地调查研究。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布兰德拜访了身在上海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其进行亲密交谈。后来他又到英中公司工作，常驻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铁路贷款事宜。

布兰德站在时代的背景下，从家庭伦理、性格、官场等多角度分析了李鸿章及其所处的晚清社会。作者对李鸿章的很多见解大加欣赏，而对其性格中自私自利、喜欢钱财的毛病又极力鞭策。总之，可以说是较客观、全面地给李鸿章一评价。不过由于时代和视角立场的不同，作者认为李鸿章是19世纪的创造者，英国人戈登是中国人的福音，而对于李鸿章的对头张之洞等人则是近似大肆贬低。这些都需要各位看官擦亮眼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徐志晶

2012年5月1日于北京昌平

## 外版前言

每天在下议院大厅里，都会上演一出精彩的好戏。其中，斯皮克（Speaker）先生的列队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仪式开始的时候，有卫士在前面举着手杖开路，斯皮克先生走在卫队后面，他的身边是首相和国务大臣。布莱克·劳德（Black Rod）每次来开会时，都先要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用尽全力把门关三次，而且这个动作一定要当着斯皮克先生的面，且态度是那么郑重。这样之后，他才将下议院的议员们集合到上议院里，开始召开例会。

在我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幕就发生在20年前的一个夏天的下午，那天，我正走出议会大厅时，与一个人不期而遇。此人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身材高得出奇，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走路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那步伐是如此端庄，举止是那么文雅。每当别人看向他时，他都还以微笑，那微笑传达出的是一种感激之情，而且是那么优雅得体。总之，此人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他就是李鸿章。如果仅从容貌上看，我认为，无论是这代人还是上代人，都无出其右。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他取得了别人无法超越的成就，也不是因为他拥有令人仰视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种出类拔萃、近乎于半人半神的风采，以及那种不可忽视的优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早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经历

了久远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纵然到了如今，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是要远远落后于中国。伴随着政治的起伏变化，中国人总是感到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因而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于是在别的国家的政治事宜面前，总是摆出一副相当淡定的样子，感觉自己相当尊贵。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贯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不愿意，也不屑于接受外来信息。1715年，约翰·贝尔先生作为彼得大帝派到中国的一个使团的成员之一，曾到中国访问。诚如他后来说的：

中华帝国差不多处于与世隔绝的位置，那里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气候舒适，特别适宜人居住。这里的东、南面都被大海包围着，西、北方则是一系列绵延起伏的高山，以及荒山野岭。在这里，有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保卫着这个国家，抵御着外来者的侵犯。而我觉得，在它的西面绵延几百里的贫瘠的沙地，其实更能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实际上，这个国家的东、南两面的海洋仿佛是张开的怀抱欢迎着外来者进入，所以中国极有可能因此遭受到的侵犯是来自海上的。不过在我看来，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君王都会觉得，让这个强大的民族保持着它的宁静对于大家似乎更为妥当。这一民族本身也很希望能与邻国和平相处，实际上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土内怡然自得地生活着。

正如约翰·贝尔所说的，一个多世纪之后，来自外国的侵犯首先在东南海区发生。在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中国头号政治家，而且对于这一称号，他受之无愧，因此在19世纪的历史的天空中，他享有自己应得的那一席之地。当新的危机降临到这个古老的国家面前时，他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尽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出身和性情，以及他所在的民族的传统决定了他对于外来者保持着一种轻蔑的态度。但是，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洋鬼子”不容忽视，也是第一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在中国政坛上，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中，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对于李鸿章身上的缺点，布兰德先生曾在文章中予以指出。其实，这些缺点出现在一个对政治总不是那么敏感的民族的成员身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正是来自这样一个民族的人，却引领着这个东方大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而且其指挥手段是那么老练。所以，单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他的身上存在着许多缺点，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单是为他的国家，还为他本人。这也为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了远超其国际地位的史无前例的发展。

巴兹尔·威廉斯

1917年3月

# 目录

译者的话 / 001

外版前言 / 001

## 第一章 李鸿章起步前的中国形势 / 001

第一节 这个帝国很官僚 / 003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一声响，老李变成了改革党 / 014

第三节 西方人眼中的李鸿章 / 023

## 第二章 瞧，这一大家子 / 031

第一节 爹和娘 / 033

第二节 老李不厚道 / 036

第三节 富不过二代 / 053

## 第三章 老李奋斗史 / 067

第一节 老佛爷的红人 / 069

第二节 谁也扳不倒的智慧 / 082

第三节 亦官亦商总为钱 / 101

## 第四章 外交三十年（一）：法兰西和日本 / 111

第一节 以夷制夷 / 113

第二节 “痞子李”在天津 / 119

第三节 感谢中法战争 / 129



第四节 小心日本 / 140

## 第五章 外交三十年（二）：俄国 / 163

第一节 伊犁事件 / 165

第二节 铁路修到东北来 / 174

第三节 退休不“下岗” / 179

第四节 英国小店主 / 190

## 第六章 近代中国军事之父 / 195

第一节 谁为老李辩护 / 197

第二节 我的北洋海军 / 205

第三节 都是官僚惹的祸 / 212

第四节 忠于太后忠于己 / 219

## 第七章 与时俱进的政治家 / 225

第一节 天生属于当权派 / 227

第二节 老李也是“维新派” / 233

第三节 与红衣主教撞了一下腰 / 239

## 第八章 19世纪的中国开创者 / 249

第一节 东方俾斯麦 / 251

第二节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 / 258

第三节 江湖仍在流传他的传说 / 274

## 第一章

# 李鸿章起步前的中国形势

作为1850年以来，诸多社会变革的创始者，毋庸置疑，李鸿章理应被看作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不过，诚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伟人”历史观的评论中所说：“务必把伟人和诞生了他的社会环境共同视为先前历史的产物。伟人也隶属于整代人，他与同代人一样，均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



## 第一节 这个帝国很官僚

作为1850年以来，诸多社会变革的创始者，毋庸置疑，李鸿章理应被看作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不过，诚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伟人”历史观的评论中所说：“务必把伟人和诞生了他的社会环境共同视为先前历史的产物。伟人也隶属于整代人，他与同代人一样，均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大人物的功和过，我们不妨仔细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以此来研究他的发迹。

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在谈论李鸿章一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前，简要回顾一下李鸿章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关注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声名大噪，从而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也正是此时，西方军队和商人的持续入侵，使得中国结束了封闭的状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对于天性反感改革的民族，势必很难适应这个过程，并且会给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很大危险。在同时代人



壮年李鸿章



1896年间的李鸿章

中，差不多只有李鸿章意识到必须效法日本，从根本上革除旧有的教育和政治体制，才能抵制外来的入侵。中国政府认同的治国之道，千百年来在自给自足经济下行之有效。目的就在于维护道德力量和既有文明的持久不变。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一个事实：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将迅速代替中国的古老传统，将其丢进历史的垃圾场。尽管李鸿章意识到了，并且积极地引导自己的同胞认识这一真理，但是不论从

中国人的天性，还是李鸿章自身的一些官僚特征而言，都注定了他的失败。不可否认，李鸿章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对金钱的迷恋，使得他的工作效用受到了损害。就连他最具进步意义的追求，也被固有的偏见破坏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简单回顾一下李鸿章初登政治舞台时的社会环境。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获得重要进展，李鸿章正是由于这个机缘，靠镇压有功首次获得慈禧太后的嘉奖和同僚们的钦佩。此时，李鸿章刚刚28岁左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进入翰林院学习。历时13年、波及9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跟中国历史上其他反复循环发生的大动乱一样，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所说：

回顾一下中国自唐末以来的历史（或者概括地说，从诺曼底人将英格兰征服以来），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发生：复制那些“天命已尽”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与休养生息。在一个灌输消极抵抗

原理和把不顾一切繁衍后代当成宗教责任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的。这里的经济压力显然要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而且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便是以广大地区的人口消亡为代价。现在还健在的人的记忆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反清运动造成了多个省份的人烟稀少，只好从邻省移民。不过接下来他们又将再次面对饥荒这个可怕的幽灵。



李大人的最后岁月

倘若中国在地理上仍旧处于与世隔绝的地步，在政治上仍旧沿袭着其自给自足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其人口的过快增长必将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影响；同样，这种人口过剩的现象也必将由这两种情况导致的大规模的灾难来减少。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无奈的命运，也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习惯于接受的现实。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在国家组织机构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得以恢复的力量也会更为强大，于是它可以让自己在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中全身而退。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以法治国的原则，以德治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也令它将自己的文明建立起来，那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文明。纵然历经无数的灾难，这种文明仍然顽强地建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历经几位皇帝的统治后，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日益腐朽，单凭传统的道德法则已经无法继续它的统治，这就使得不同于从前发生的任何一次动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得以借助于严禁延续自

然的法道去将其推翻。尽管最后在外国人的武力帮助下，这个已经腐朽无能  
的清政府的统治得以延续下来，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它在老百姓心中的权威  
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而且想要恢复它固有的权威地位的希望极其渺茫。在目光  
远大的人看来，这个东方大国已经面临着变化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正日益迫  
近，等待着它的未来之路将是越来越暗淡。

李鸿章本来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共同对付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他  
和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外国人相识，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与这些  
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可怕现实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那就是：  
这些欧洲人所拥有的军队力量是那么强大，中国仅凭着当时的军事和治国之  
策，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而且，他清醒地看到，中国如果想维护自己的主权和  
独立，依旧沿袭传统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必然的结  
局。于是，自那之后，他穷尽一生的力量想让自己的国人明白这个事实，走在  
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事实的艰辛的道路上，李鸿章以近代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  
影响着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也因为如此，他被世人看作19世纪的一位佼佼  
者。本书就以阐明这一影响及其产生的方式为写作目的。

1867年，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到了西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冲击是相  
当可怕的，必须将国家的政府系统和防务加以重新组织，以此对抗这种必要  
性。可以说，这份奏折可以用来对他此后的外交官和行政官经历中的一些做法  
进行解说，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因为这个观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其下  
不断地添加附注。不过，只是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此观点投以关注的目  
光，因为提出这个观点的李鸿章是当时的湖广总督。他在奏折中指出，因为中  
国面对外国人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力量无以为应对，因此请国家一定要进行革  
新。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国家的政治情况，鉴于满朝官员对西方思想的戒备  
心理，鉴于各省总督和首都的各重要部门的实际情况，要将这样的一份奏折呈  
递给皇帝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满朝官员中，不管是当  
朝的皇帝，还是御史等高级官员，甚至普通的士人，都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

始终将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中央帝国，对其他外来的国家不屑一顾。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大总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中国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加以解说，而这种特征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是一样的。从理论上分析，自从远古时建立国家，直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完全专制的统治，而这个统治借助于儒家学说，贯穿于历朝历代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然而事实上，除了那位处事果断的乾隆皇帝，其余身处万人之上的皇帝毫无创新意识，他们就如同政府天



李鸿章官服照

堂这座建筑上那颇具观赏性的盖顶石，被国家的法令和制度限制着，每天按规矩例行公事，以至于和被长期囚禁于紫禁城的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作为奉天命行事的皇帝，他本身是家族体制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祭祀长，其肩上承担着执行依照先圣规范而制定的仪式的重担。每每遇到诸如皇帝的花费和个人的费用等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希望首先寄托于官员们的善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度上，最后，甚至要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需要对事情作出裁断的时候，他缺乏自主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那些地位最低的官员。实际上，那些看似由政府发出的专制权力，却掌握在这些官员的手中。不过，纵然这样，就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这种专制权力还是随时受限于人民对其的反叛性，也会受限于道德力量，这个中国管理制度的权威结构的基础。所以，实际上，人民天性中对民主的渴望不断磨炼着官场上那种理论上的专制统治。

1877年，W. F. 迈耶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就自己所观察到的中国政



府的情况进行如下表述：

遍布全国的官僚制度是中国政府统治的基础，而构成这个官僚制度的成员是通过国家的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早在几百年前已经被中国反复解释过的那些至理名言是这些官员进行培育的手段。正是这些神圣的教条驱使着这些官员对任何偏离于该教条的动机都拒不接受。

不过，当时那些持着乐观主义想法的理想主义者曾声称，不久之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机构将会发生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那么激进。对此，除了上段如此精准的描述外，我们还要警告这些人：

也许借助于对这种情况的评定，我们可以将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过于乐观的想法纠正过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中国人，由上到下可以快步踏上像欧洲一样进步的康庄大道。为了收到这一理想的效果，人们就要将那些最宝贵的宗教教义性的国家原则抛弃，打倒那些在文学中最受到崇拜的人，将对于现在暂时不必过多注意的代表着正义、尊贵的王朝制度推翻，与此同时，还要忽略公平和正义。像这种改变倘若不是依靠革命引起，就是要在人民由于生活的极端贫困的压力而产生；不过，如果认为这种改变可以通过自发的行为而产生，则纯粹是妄想。

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政府的统治遭到严重的破坏，政府的威望也大减，于是想让这种威望在人民中得以长时间保持的想法已经成为妄想。不过，那些王族官僚手中的特权和实力，并不曾因为起义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他们身上的那种自以为是和傲慢的态度也不曾丝毫减弱。不同于从前的是，1860年，一个新的特征出现在这个帝国政府中，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特殊的部门肩负着处理对外事务的任务，它的名字就叫总理衙门，实际上，这个著名的部门不过是一个卑躬屈膝地巴结列强的部门。渐渐地，思想保守的军机处将这个部门归于自己名下，让其成为自己的附